

1936年的春天，美国汉学家圈子在流传一本质量很高的论文册子，它并非是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集，而是一本优雅精致的论文手写稿结集。它的作者叫卜弼德（Peter Alexis Boodberg），这是他四年来的汉学成果集，书名为《胡天汉月方诸》，意为“北方草原天空中的汉月镜像”，象征着“胡汉文化”的水乳交融。该书的写作主题是探寻中国典籍中汉语音译词的阿尔泰语源，并试图廓清汉民族与阿尔泰民族的交往交流史。尽管该书仅私人印刷了13本，但引起美国汉学界的广泛关注。“胡天汉月”的恢弘气象，也昭示着卜弼德式“全球汉学”的第一次公开亮相。

从沙俄旧贵族到汉学大家

1903年4月8日，卜弼德出生于俄罗斯远东符拉迪沃斯托克（原名海参崴）的一个贵族家庭，他的家谱可以追溯到公元1003年的Cuno男爵，男爵后裔在13世纪移民到爱沙尼亚并建立了波罗的海家族分支，1721年，彼得大帝吞并了爱沙尼亚，卜弼德家族也加入俄国。直至20世纪初，卜弼德家族仍是一个军人贵族家庭。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卜弼德正就读于一所军事院校，其少年时便善记忆，对世界各国的军舰名称、种类、吨位如数家珍。1915年，沙俄国内政局动荡，他所就读的军事院校被关停，无奈前往中国的哈尔滨避难，也正是这一段经历，让他与中华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卜弼德在哈尔滨学习中文时，其学术兴趣从军事战略研究转向语言学学习，后考入符拉迪沃斯托克大学学习语言学。稍后，他又远赴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进修东方语言学，于1924年获得东方语言学学士学位。同年，他开始研究生学习，以“东方语言助教”的身份开启了长达几十年的教学生涯。受益于伯克利大学的丰富学术资源，卜弼德有机会在诸多学术领域深耕，对日语、梵语、闪米特语、哈密特语及亚述—巴比伦语等东方语言均有广泛的涉猎。在治学方法上，则深受古兰、伯希和等法兰西学派的内亚视野和考据风格的影响，并吸收了博厄斯学派的理论与方法。

1930年，卜弼德凭借博士论文《中国古代兵法——基于〈李卫公问对〉的研究》获得博士学位，该论文



对唐代兵书《李卫公问对》进行了详细译注，并结合《孙子兵法》《吴子兵法》《司马法》等兵书典籍，探讨中国古代的军事思想与战略方法，较为完整地体现了卜弼德汉学研究的理论方法。1932年7月，卜弼德受聘于伯克利大学，担任东方语言教师。

没过几年，卜弼德便凭借一系列高水平的学术论文和东方学课程讲座在美国汉学界声名大振，3次获得被认为是国际科学艺术领域最重要奖项之一的古根海姆奖。1940年，卜弼德成为伯克利东语系系主任，开创了东方语言系杰出的时代。1960年，继弗狄南·烈辛之后，卜弼德以卓越的教研能力出任伯克利东语系第五任阿加西东方语言与文学讲师，后于1964年接任美国东方学会主席。在长达30余年的教研究生涯中，卜弼德不仅贡献了大量优秀学术成果，也为美国汉学界培养了大量学术人才，开创了“卜派汉学”，以毕生精力推动汉学成为美国学界的热门学科。

诗史译证引领汉学风尚

卜弼德在西方汉学界以博学深邃著称，治学理念与学术风格延续了加州大学伯克利东语系重视语言研究与文献研究的优秀传统，坚决抵制“语言帝国主义”倾向，追求读懂中国典籍、融入中国历史的崇高境界。卜弼德在1944年的一份工作报告中这样阐述自己的学术理想，“东方学及相关学者在研究中国问题时，应始终坚持一个原则，即中国的发展应被放置于欧亚大陆的总体发展中，从全球视野

的角度开展研究应格外注重古代中国与草原邻国、草原邻国与欧亚远西地区在语言、历史、文化的互动关系”。卜弼德摒弃了传统内亚史观，仿照远东一词创造了“远西”一词，以凸显他的历史平等观与全球史观。

卜弼德致力于各种文献的语言学分析，撰写了百余篇学术论文。令人遗憾的是大部分文章都未发表或出版，而是以小册子的形式在汉学家圈子中流传。根据1972年《美国东方学会会刊》所刊马萨诸塞大学汉学家柯恩编撰的《卜弼德论著目录》，卜弼德共出版学术专著6部，论文集2部，即《胡天汉月方诸》和《爱文庐札记》，另有公开发表文章21篇，其中不少文章均已散佚。

卜弼德一生的学术成果，主要集中在四个领域。

其一是中国语言和文字研究。卜弼德继承了芬兰学者兰司铁的阿尔泰语系观念，致力于探究阿尔泰语与汉语的关系，创制了“Sino-Altaica”（汉—阿尔泰学）一词。卜弼德经常通过一字一句的考释，对中国历史进行解读，如他在《中国的狮子》一文中将“狮子”一词的演变追溯到藏语、普鲁语及梵语，从语言学角度解读汉民族与异域民族的交流史。

就中国文字性质的问题，卜弼德在1936至1940年间与另一位西方著名汉学家、曾任美国东方学会会长的顾立雅展开过激烈论战。卜弼德完成了古汉语二项式表达的研究，并长期致力于建立完整汉字符号系统的尝试。

其二是中国中古民族史研究。代表作便是《胡天汉月方诸》。魏晋至隋唐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民族交流和融

合时期，大量北方少数民族内迁至中原定居，展现了中华文明的包容与灵活性。卜弼德坚持全球史观，将研究视野放置于中国北部边疆，他的《拓跋魏的语言》一文借助白鸟库吉、伯希和的中文——鲜卑语对应关系研究成果，对中古史料存留的有关拓跋部的只言片语进行词源、词根考析，指出拓跋魏名字的意义应为“穿过山的人”“山那边的人”，最终认定拓跋词汇属于突厥语，又混合了蒙古语元素。这是卜弼德借助音韵学知识研究中古民族史的典型，他还通过分析汉语音译的柔然语名字认定柔然语属于蒙古语系，《匈奴语言中一个突厥词汇》《东亚语言中狼、马、龙的词源学探讨》等文章也从语言学角度探讨华夏民族与中亚民族的文化交流问题。他还为《魏书·铁弗刘虎传》《晋书·赫连勃勃传》《周书》《北史》进行了精彩的翻译与注解，丰富了西方史学界对中国中古时期的历史认识。

其三是中国古代文学及文学翻译研究。1954年夏天，卜弼德整理出版了一部简短精炼的文章合集——《爱文庐札记》，每篇文章的篇幅都经过精心设计，一张打印纸即是一篇短小精悍的学术论文，其中《论中国诗歌中的隐式骈文》《论中国诗歌中的隐式谓语》《论杜甫诗歌的通俗性》等文章，为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作出了卓越贡献。有趣的是，他对古代诗歌的翻译充满了各种令人惊叹的创造，以拉丁语为词根，发明了“teknarch”和“chemromatic”等表意深刻的新造词，而这种英语语言的开发也被学界慢慢接受，李约瑟指出，“以这种方式解读古代中国技术术语是学术上的必

突出运营创新，贯彻用户思维，迭代产品渠道，改进受众体验。用户在哪里，传播就跟进到哪里。实行移动优先、内容为主、流量说话，全力加速主力军挺进国际传播主战场。适应“四全”媒体时代，贯彻“正能量是总要求，管得住是硬道理，用得好是真本事”要求，以精准化、分众化、视频化表达满足智能传播需求，以大流量澎湃正能量，让“最大变量”成为“最大增量”，提升用户黏性，以优质服务化流量为“留量”。

突出范式创新，善于借力、借势、合力，加强外线作战。强化借船出海、借筒传声、借台唱戏，全力扩大与海外主流媒体平台和人员合作力度，建强区域性媒体合作机制，提升合作传播水平。突出目标导向效果导向，抓住关键少数，积极推动构建新型国际组织、媒体智库人文交流高端品牌影响。提升“新闻+政务服务商务”能力，打造传播新业态新平台，为来华旅游、留学、营商人士提供浸润式服务平台，不断增强口碑传播效应，影响“有传播力的人”。

坚持问题导向，聚焦打通痛点堵点破局之道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坚持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的突出特点，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鲜明风格。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每个时代总有属于它自己的问题，只要科学地认识、准确地把握、正确地解决这些问题，就能够把我们的社会不断推向前进”。坚持问题导向，增强问题意识，运用党的创新理论研究新情况。

做好新时代国际传播，要准确认识和把握当前国际传播领域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牢牢扭住加快改变“西强我弱”国际舆论格局这一根本目标，敢于啃硬骨头，致广大而尽精微，对当务之急要紧盯不放、破解难题，对长久之计要持之以恒、久久为功，努力实现从走出去到看得得到、读得懂、易接受、愿分享、成共

要，精确必会战胜保守主义”。

其四是传记和哲学领域的研究。代表作是《孔子小传》和《老子小传》，卜弼德的写作目标并非是单纯介绍传记主生平，而是试图摆脱翻译过程中传统英语的刻板化表达，澄清中国传统哲学和伦理学中关键术语的真正含义，致力于“君子”“政”“德”“礼”“义”等术语的字形结构及其远古词源的研究，阐明自己对中国哲学尤其是孔子哲学的自我认知。他经常自称孔子门徒，身边人也打趣他具有儒家的尊严和礼仪感。

1972年6月，卜弼德病逝。卜弼德生前一直忧心美国汉学界的发展前景，曾不止一次讽刺学术生活的计算机化，但他的学术思想一直引领着美国汉学界的发展。在他去世后的几十年里，他的学生将“卜派汉学”发展成一种特殊的学术风尚。我国翻译家王靖献认为，“卜派汉学”讲求对中国典籍的把握，对字词、章句性质的了解，探索文字的源头，分析文字的发展，凡事讲求历代字书的证据为依托，辅之西方文字训诂学理论，不惜与中国的历史发展相违背，将“汉学”作为直指古典的学术探索。

“卜派汉学”的跨文化汉字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一方面，他格外重视对隋唐以前传世文献的解读，在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上作出了突出的成绩；另一方面，他明显对明清以后的中国学术传承重视不足，在一些考据工作上做了重复性劳动。他对甲骨文释读成果的评价不高，甚至认为“这些新发现（甲骨文等）对研究中国古文字学的关键问题，即字与词的关系，是一个障碍”，中国国内的古文字

学研究造成了音韵学与文字学的分离。当然，这并不影响他在国际汉学界的重要地位。

推动中华文化的普及和国际化

自1940年开始，卜弼德便担任伯克利东语系系主任，他的教学风格和研究取向奠定了东语系的发展基调，引领了纯正的学风建设。他认为，学者的追求应是对知识的沉思珍惜，对真理的不懈追求和对他人的永恒指导，在此理念的支撑下，他开创了“中国词典和书目”“东亚全典”等一系列原创性课程，引进大量东方语言学课程，鼓励学生们广泛学习各种语言，拓展学术视野，在读懂典籍的基础上进行研究。同时，他还是一位广受欢迎的通识教育讲师，开设多年的“中国文明”“孔子的生平和时代”课程吸引了大量师生前来旁听，提高了伯克利师生对中华文化的认知与鉴赏能力。作为系主任，卜弼德也广聘名师，给予黑尔芬、奥利什基、玛丽·哈斯、斯泰宁等学者优渥待遇，培养了薛爱华、鲁道夫、司礼义、马瑞志等国际知名的优秀汉学家。

在卜弼德的带领下，伯克利东语系举办了东方主题的研究会议，创立东方学术讨论会和美国东方学会西部分会，每月定期聚集旧金山湾区的亚洲研究学者召开学术研讨会，使研究成果的受众普及更加广泛，成功扩大了伯克利东语系的影响力。此外，卜弼德也积极开展个人演讲，如1960年以“翻译之莫尔（The Moil of Translation）”为题开展系列演讲，1964年在美国东方学会的年会上发表主题讲话，演讲内容涉及中华文化的方方面面，向普通民众展示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为中美关系正常化营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

“大事刻在石板上，小事记在纸条上”，这是卜弼德写在《胡天汉月方诸》扉页上的自省之语，也是一生的真实写照，他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热爱的汉学事业，正如丰碑上的印记，被世人铭记。



（上接1版）我们要着力对外阐释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九州共贯、多元一体的大一统传统，修齐治平、兴亡有责的家国情怀，厚德载物、明德弘道的精神追求，富民厚生、义利兼顾的经济伦理，天人合一、万物并育的生态理念，实事求是、知行合一的哲学思想，执两用中、守中致和的思维方法，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的交往之道，让世界看清楚现代中国从哪里来，从绵延不绝的中华文明中认知认同一个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

生动展现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向世界诠释现代中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要让世界充分认识到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所承继并光大的突出特性和因“结合”而再次迸发出的先进性，认识到中国道路的历史必然、文化内涵和独特优势是辉煌发展成就的成功密码，让世界认识到中国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认知认同一个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的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

弘扬传承文明基因，向世界描绘未来中国。准确揭示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当代中国文化的根基，亲仁善邻、协和万邦是中华文明一贯的处世之道。向世界阐释好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尊重文明多样性，在求同存异中追求共同进步。讲清楚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无论自身如何发展，中国始终致力于推动文明交流互鉴，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

坚持胸怀天下战略定位，深入讲好人类命运共同体故事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共产

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党，也是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党。习近平总书记以宽广的世界胸襟和宏阔的历史视野，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科学回答了“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时代之问，为实现世界永续和平发展提供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坚持胸怀天下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思想的重要立场观点方法之一，也是我们做好国际传播的工作基点和价值所在。

做好新时代国际传播，要坚持中国立场，拓展世界眼光，厚植人类情怀，从人类发展大潮流、世界变化大格局、中国发展大历史中正确认识和处理好外部世界的关系，讲清楚“共谋发展是历史潮流，互利共赢是人心所向”的中国道理，讲清楚“中国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的中国实践，讲清楚“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的中国方案。

讲好全球发展倡议故事，用十年建设成就讲好“一带一路”是中国提供的国际公共品和国际合作平台，是破除发展赤字和平和之路、繁荣之路、开放之路、创新之路、文明之路。展示中国努力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与各国分享发展机遇，推动全球发展迈向平衡协调包容新阶段，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实现优势互补、合作共赢，增强经济社会发展内生动力，促进世界繁荣发展，阐释好中国始终做全球发展的贡献者。

讲好全球安全倡议故事，彰显中国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零和博弈，着力破解和平赤字，为变乱交织的国际格局增加更多稳定性，为世界和平发展提供更多正能量，筑牢和平根基，促进共同安全，阐释好中国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

讲好全球文明倡议故事，充分说明中国在尊重多样性中寻求一致性，坚持求同存异、求同化异、聚同化异，和而不同，注重成风化人，增强亲和力、吸引力，促进民心相通，做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弘扬全人类共同价

值，画出最大同心圆的故事，阐释好中国始终做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的推动者。

坚持守正创新成功之道，全力提升国际传播效能

坚持守正创新，是马克思主义真理观的鲜明体现，是对党的思想理论和实践发展重要经验的深刻总结，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鲜明的理论品格。对广大新闻舆论工作者来说，“守正”守的是始终牢记党媒姓党，旗帜鲜明坚持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要求，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舆论导向、新闻志向和工作取向，传承红色基因，把党的声音传得更广更远。“创新”就是面向大国话语权竞争主战场，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主动求变，以守正创新的正气和锐气，全力解决国际话语权“卡脖子”问题，努力掌握国际舆论主动权，不断提高国际传播效能。

做好新时代国际传播，要扎实推进内容创新、形式创新、渠道创新、运营创新、平台创新、技术创新和机制创新等全方位创新，推动媒体深度融合，着力完善传播渠道、优化海外布局，健全体制机制，破解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以自身的高质量发展为民族复兴提供坚实舆论支撑。牢牢把握涉华话语权主导权，精心构建话语体系，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讲好中国共产党故事，讲好我们正在经历的新时代故事。

突出话语创新，大力推进内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直面热点，精心设置议题，亮明观点，主动发声，推出更多高品质抓人心具有穿透力共情力的精品力作，在国际舆论场有力有效增加中国内容供给。尊重传播规律，突出以“例”服人，用鲜活事实说话，用扎实数据说话，扩大共同认知，以发展成果吸引人；强化以“理”服人，塑造价值认同，用中国道理劝服人；注重以“情”动人，用个体故事实现群体共情，加深情感共鸣，不断提升中国故事吸引力感染力。

识，全力扭转信息流“逆差”、中国真实形象和西方主观印象的“反差”、软实力和硬实力的“落差”。直面攻击抹黑，发扬历史主动精神，针锋相对，坚决斗争。提升斗争本领，在原则问题和大是大非面前旗帜鲜明、立场坚定，提升评论力度锐度强度，当战士、不当绅士。亮明中国态度，坚决解构“中国威胁论”“中国经济胁迫论”，揭露美西方恃强凌弱、以邻为壑、巧取豪夺的霸道霸权霸凌之实；讲清楚“吹灭别人的灯，并不会让自己更加光明；阻挡别人的路，也不会让自己行得更远”的道理。

直面重点人群，面向不同地区、不同圈层实施精准传播，特别要面向青年、依靠青年、传播青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未来属于青年，希望寄予青年”。新时代青年自信自立，是平视世界的新生力量。实施国际传播未来工程，聚焦国外“Z时代”群体，搭建全球青年文明交流新平台，以青年喜闻乐见的方式，积极构建“Z世代”国际朋友圈，为彻底打破美西方话语霸权夯实民意基础。

直面内循环困境，破除外宣内宣化倾向，以效果导向根除国际传播内循环内循环，提升出圈出海水平。研究受众接受习惯和特点，在乐于接受和易于理解上下功夫，在顺应受众语言转换、思维习惯、表达方式上下功夫，以讲情感感染人、以讲道理影响人，增强国际传播的亲合力和实效性。

坚持系统观念，全力构建适应新时代需要的国际传播新发展格局

坚持系统观念，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认识论和方法论，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基本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发展地而不是静止地、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

系统地而不是零散地、普遍联系地而不是单一孤立地观察事物，妥善处理各种重大关系”。

做好新时代国际传播工作，要贯彻“重塑外宣业务、重整外宣流程、重构外宣格局”部署，把系统观念与国际传播工作相结合，把落实党对国际传播工作的重大部署摆进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考虑，坚持整体谋划、系统重塑、既补短板强弱项，又固底板扬优势，对症下药、标本兼治，做到“十个指头弹钢琴”，发挥优势，扩大合力，琴瑟和鸣，全面提升传播效能。

加强顶层设计，精心构筑适应新时代需要的战略传播体系。创新体制机制，把我们的制度优势、组织优势、人才优势转化为传播优势。统筹运筹好以内容建设为根本、先进技术为支撑、创新管理为保障的三位一体全媒体传播体系，拥抱新技术，抓好技术赋能、服务赋能、活动赋能、研究赋能，以战略主动赢得发展主动。

着力构建大宣传工作格局，为“大外宣”建设赋能。统筹好专业队伍、地方队伍、企业队伍、民间队伍等组合力量，协调好主力军、游击队、民间力量等各方力量，充分发扬各自优势，互相赋能，争取实现双赢、多赢，全力打造国际传播生态圈。

坚持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统筹发展和安全。“不困在于早虑，不穷在于早豫。”强化风险意识，坚持底线思维，提高防风险、迎挑战、抗打压能力，完善风险防控机制，守住安全底线，确保生产安全、人员安全、发展安全。

为学之实，固在践履。学习的目的全在于运用，我们要牢记主题教育“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的根本任务，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转化为坚定理想、锤炼党性和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强大力量，把党的创新理论的世界观、方法论和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转化为科学思想方法工作方法，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不断提升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营造良好舆论氛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积极贡献。

（作者系中国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